《北京中医药大学校志》补遗研究五则*

宋珊珊[1]　陈子杰[1,2#]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 北京 100029; 2 国家中医药典籍翻译与传播中心 北京 100029)

摘要:《北京中医药大学校志》由学苑出版社在2002年出版,详细记载了1956—1992年北京中医学院(今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编纂体例以图、表、录等配合文字内容为主,其内容纲举目张,纵述历史,横陈全貌,且实事求是,客观真实,体例统一,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对于北京中医学院建院初期的相关记载有混淆或者模糊之处,故经详细论证,从北京中医学院建院初期的联署办公机构名称辨正、《北京中医学院学报》(今《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创刊意义的挖掘、首届学生学制的变化过程析疑、教材版本界定标准的调整及首届毕业生人数的核实5个方面进行补遗研究探讨,在筑牢大学文化认同感,整合多元证据开展历史复原,补遗勘误推动校史研究学术化等方面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北京中医药大学校志》;补遗;校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8.2　　**doi:**10.3969/j.issn.1003-305X.2026.10.418

Five supplementary studies on the Chronicle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SONG Shanshan[1], CHEN Zijie[1,2#]

(1 Museum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2 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CM Class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Chronicle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published by the Academy Press in 2002, provides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and institutional status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formerly Beijing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1956 to 1992. The compilation employs a structured format integrating illustrations, tables, and records to support the textual narrative. It systematically outlines historical evolution while presenting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the institution's operations, adhering strictly to principles of objectivity, factual accuracy, and editorial consistency. Consequently, the work possesses significant historical and archival value. However, due to various constraints, certain records regarding the university's early founding period remain ambiguous or inconsistent. Through rigorous textual research and analysis,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se gaps by conducting supplementary investigations in five specific areas: the correction of the names of the initial joint administrative offic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foundational significance of the Journal of Beijing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 analysis of the evolving academic duration for the first cohort of students; a revision of the criteria for defining teaching material editions; and a verification of the number of graduates from the inaugural class. This research serves as a crucial reference for strengthening institu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narrative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diverse evidence, and advancing the academic rigor of university history studies through textual criticism and supplementation.

宋珊珊,女,硕士,副教授

#通信作者:陈子杰,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chenzijie2002@163.com

*基金项目:北京中医药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揭榜挂帅项目)(No.2025-JYB-JBGS-041)

Keywords: Chronicle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supplementation; university history studies

校志作为校史的权威文本载体，承担着“存史、资政、育人”的三大使命[1]。《北京中医药大学校志》（以下简称《校志》）系北京中医药大学（以下简称“本校”）校志编委会编纂，于2002年12月由学苑出版社出版，总字数约120万字，详细记载了1956—1992年北京中医学院（今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涵盖党建行政、机构组织、教育科研、医疗服务等多项事业发展的基本信息，其资料记载详细，收录齐全，是研究本校校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然而从实际研究来看，受历史条件、资料获取局限等因素影响，《校志》在编纂过程中也偶有记载疏漏、偏差乃至错误，这也是历史文献编纂中的常见现象，因此，本文在研究中结合相关史料，针对《校志》个别疏漏进行研究，以期更好地促进本校校史研究。

1 《校志》的编写特点

《校志》编纂体例以图、表、录配合文字内容为主，避免叙事抒情，凸显“依时纵述，要素齐全”[2]465-466的志书编写特点。

1.1 纲举目张，纵述历史，横陈全貌

《校志》正文目录分为篇、章、节、目4个层次，横排门类，纵写史实，《校志》正文分为15篇，细化为“领导体制与组织机构”“教师与职工队伍建设”“教育”“系、部、医院”“科学研究”“医疗”“学术交流”“教学”“科研服务设施”“校办产业”“行政管理”“党的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群众团体”“学院挂靠单位”，附有大事记、后记。15篇又累计分为79章，如“教育”篇下设“概况”“本、专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中医学专业（七年制）教育”“外国留学生教育”“成人教育”6章。各章下又分若干节，如“本、专科教育”章下又分“专业设置 学制 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德育”“智育”“体育”“教育管理”“教学质量评估”7节。节下还要设若干目，如“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节下分“中医学专业”“中医养生康复专业”“中医基础医学专业”“中医学（七年制）专业”“中药学专业”“针灸推拿学专业”“中医卫生事业管理专业”“中医护理学专业（3年制大专班）”8目，由此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前期发展保存了详细的史料，保证横不缺项，纵不断线。

1.2 实事求是，客观真实，体例统一

《校志》以实事求是为编写原则，力求客观而真实地记载学校的发展历程，尊重历史事实，客观阐述，严格遵循规定的体例章法来编写，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且图、表不单独成篇成章，各部分均以文字描述搭建内容框架，且不夸大形容，也不妄加评议，平铺直叙，同时在有关篇章之中，将繁杂数据以图、表、录形式进行展示，以完善细节，使文字与图表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同时，《校志》对于历史发展脉络中的重点内容详细记录，如第3篇“教育”第2章“本、专科教育”第2节“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中，除了在各目下配有“时间分配表”“各类课程学时分配比例表”等表格外，还专门配有27个表格逐一介绍各专业各班的教学计划进程，说明在本、专科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中，具体的教学内容是重点。在收录人物中，也是严格分类，已故人物纳入“人物传略”，健在人物纳入“人物简介”，未能收入“人物传略”“人物简介”者则纳入“人名录”。这样的形式使得《校志》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可以称为“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2]467。

2 《校志》补遗五则例证

鉴于《校志》涉及本校建校36年以来的信息汇集，时间跨度大，资料涉及广，所以在建校初期有关机构名称、学报出版、学制安排、教材统计、学员信息等方面的记载有混淆或者模糊之处，值得补充完善。

2.1 建校初期的联署办公机构名称辨正

《校志》综述部分记载：“1956年4—7月是北京中医学院的筹建时期。学院的筹建工作是中央卫生部委托北京市及北京中医进修学校进行的。当时，北京中医学院与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实行联署办公。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校长顾德、副校长哈玉民、沈玉峰，教务主任陈彤云，以及该校教工，均为学院筹建做了准备工作。”[3]1此段记述清晰地指明了联署办公的机构为“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并列举了该校主要领导。而在《校志》第十一篇“行政管理”第一章“校址的选择与房产”的第一节“校址的选择”正文中第一段写道：“1956年8月6日，国二办字〔第19号〕批文精神，北京中医学院由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筹备成立。同年9月新招生的120名第一批学员入校，因任务紧急遂借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地址，进行教学工作。”[3]549，此处一个段落中同时出现了

“由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筹备成立”和“借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地址”2种不同表述,表明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北京地区的2所中医进修学校未能进行明确区分。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地区相继建立了2所中医进修学校即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和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分别承办北京地区及全国中医师的进修教育[4]。

笔者也搜集到2所学校的毕业证书:1952年北京中医进修学校的毕业证书,其名誉校长为彭泽民,副校长孟昭威,教务主任于道济。具体见图1。



图1　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毕业证书

1955年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毕业证书,校长为顾德、副校长哈玉民。具体见图2。



图2　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毕业证书

由此可知,《校志》记载的“校长顾德、副校长哈玉民”系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领导,与北京中医学院联署办公的机构就是“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而非“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从证书左侧授予单位印章可以看出,北京中医进修学校直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而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归北京市卫生管理局(今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管理。《校志》一个“市”字之差,混淆了2所不同层级与职能的学校,为此有必要进行勘误。

2.2　《北京中医学院学报》创刊意义的挖掘

《校志》记载:“《北京中医学院学报》创刊于1959年10月,当时为不定期内部刊物……”[3]496此记载对《北京中医学院学报》(以下简称《学报》)的创刊背景与内容未能更多挖掘。《学报》的建设是国家中医药政策的一项重大成果。

《学报》创刊号封面印有“庆祝建国十周年”,出版日期为1959年10月1日,创刊号中的《创刊词》更是明确指出“我们将它作为献给伟大祖国建国十周年的礼物”。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以本校为代表的中医药高等教育开始步入正轨,经过3年筹建与发展,至1959年,亟需一个学术阵地以践行国家政策、汇聚科研成果、展示学术思想、引导学术发展。《学报》选择在国庆10周年创刊,既体现了本校“与党和国家发展进程同频共振的历史逻辑”,也昭示了其办学理念中鲜明的红色基因。具体见图3。

1959年,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国家大力提倡“中西医团结”,并希望“用现代科学方法,加以发掘、整理和提高我国医学遗产”[5]155。因此,《学报》创刊号的文章也是当时中医药高等教育医教研发展的重要成果展示。如京西矿区实习医疗队的《对胃脘痛辨证论治的体会》文章反映了当时学院师生深入煤矿等基层一线,为工人阶级服务,体现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6]的教育方针。针灸教研组在临床中的2篇报告《经络测定仪的性能临床鉴定报告》和《针灸临床观察手、足少阳经经络现象的报告》是党的中医政策中“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加以补充修正”[5]143的具体体现。另外,1959年6月12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整理研究推广秘方验方的通知》,对于“明确其适应证的范围”的秘方验方,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推广应用”[5]162。为响应号召,《学报》也刊载了2篇文章——《实验经济方》《外科简便验方》——分别推荐了经济方60首,验方32首,详细标注了主治病症以推广应用。《学报》创刊号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中医药政策,是极具红色基因的中医药类期刊,值得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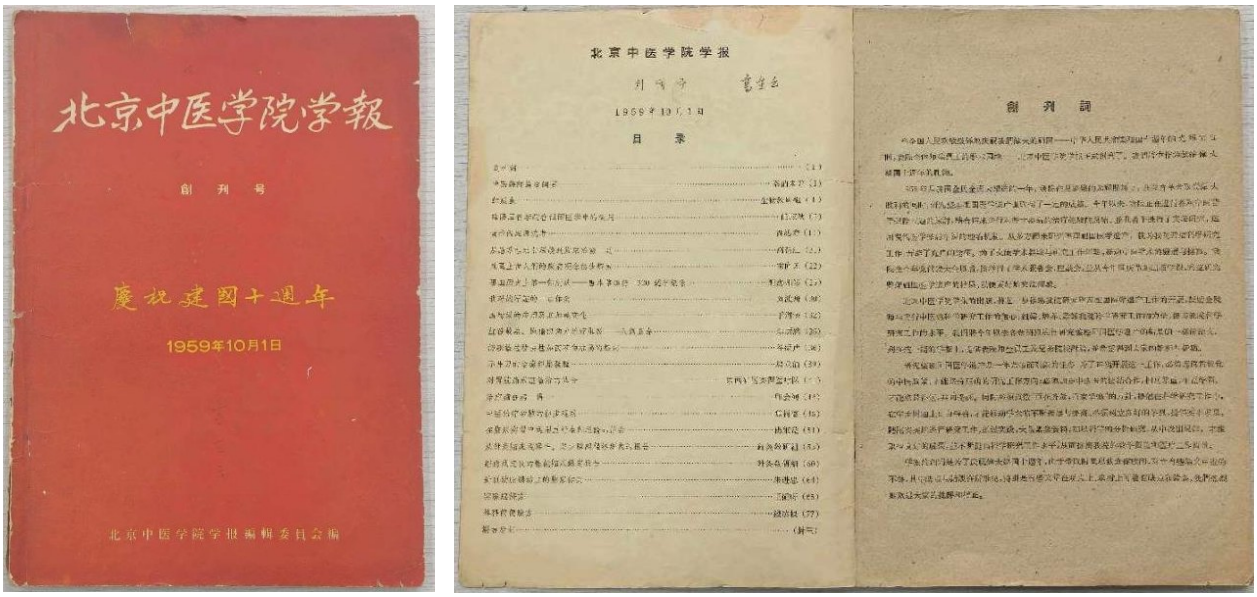


图 3　《北京中医学院学报》创刊号封面及创刊词

2.3　首届学生学制的变化过程析疑

《校志》关于首届学生学制的记载为："北京中医学院成立后，即在同年 7 月从全国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招生中录取了第一届中医专业六年制学生 120 名。"[3]1而在 1956 年 9 月 4 日《光明日报》头版新闻《北京、上海两所中医学院开学》中指出"学院是五年制的，前 3 年讲授《内经》《伤寒论》等中医学（内容），后 2 年教授现代的基础医学……"可见建校之初中医学院的学制应是五年制。为此，在中国高等院校教育最初的探索中，学制应是有所变化的。《校志》也指出"1956 年 6 月，国家卫生部制定了《中医学院医疗专业教学计划（修正草案）》，学制暂定 5 年"[3]89，又写到"1957 年暑假后，国家卫生部颁发《中医专业试行教学计划》，学制为 6 年"[3]89，可见，在中医药院校教育的发展中，中医学院中医系的学制是由最初的五年制设想变为六年制执行。1962 年 12 月 5 日，卫生部发布的《关于中医学院教学工作的几个问题和执行 1962 年修订的六年制中医专业教学计划的通知》中指出："1959 年我部制定的中医专业教学计划，规定学生在 6 年中间，学习中医的时间……"[5]198这说明在 1959 年卫生部最终制定并推行了六年制的学制。《校志》对于首届学生学制变化过程并未明确解读。

对于中医学院中医专业学制的问题，一直是中医药高等教育初期探索的重要内容。如 1962 年 7 月 16 日，有感于当时本校第一届毕业生的培养情况，本校秦伯未、于道济、陈慎吾、李重人、任应秋老先生以《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为题，直指中医药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中医人才培养的思路与方法提供了重要借鉴，文中也对学制的问题提出了建议："中医学院的毕业生，主要是学习中医的时间太短，六年制的中医学院，实际上学习中医只有 3 年。用 3 年多时间要求学好中医，时间上显然是不够的。"[7]324并且根据 6 年的教学经验对教学计划提出建议："我们（的）意见：用一年半时间学习中医基本理论和临床，用 3 年的时间学习中医临床各科结合实习。共 4 年半学习中医，另一年半学习普通课（包括古文）和西医学课。"[7]324不仅清晰划分了中西医课程之时限，更确保了中医学术传承之主体性与系统性，具体见图 4。卫生部遂于同年 9 月专门召集全国中医学院教学工作座谈会，集思广益，对此意见进行深入研讨与吸纳。并于 1962 年 12 月 5 日发布《中医学院教学工作的几个问题和执行 1962 年修订的六年制中医专业教学计划的通知》，要求"学习中医的时间（4 年半，包括毕业实习 1 年），学习普通课与西医课的时间（1 年半），学校不能擅自变动"[5]202。

《校志》简化了学制从"五年制"规划到"六年制"实施的动态演变过程，而这一过程恰恰反映了主管部门和学校在办学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调整培养方案的探索精神，是中医药高等教育早期制度建设的生动体现。《校志》对此应予以补充说明，并收录《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以期还原中医药高等院校教育的历史的复杂性与动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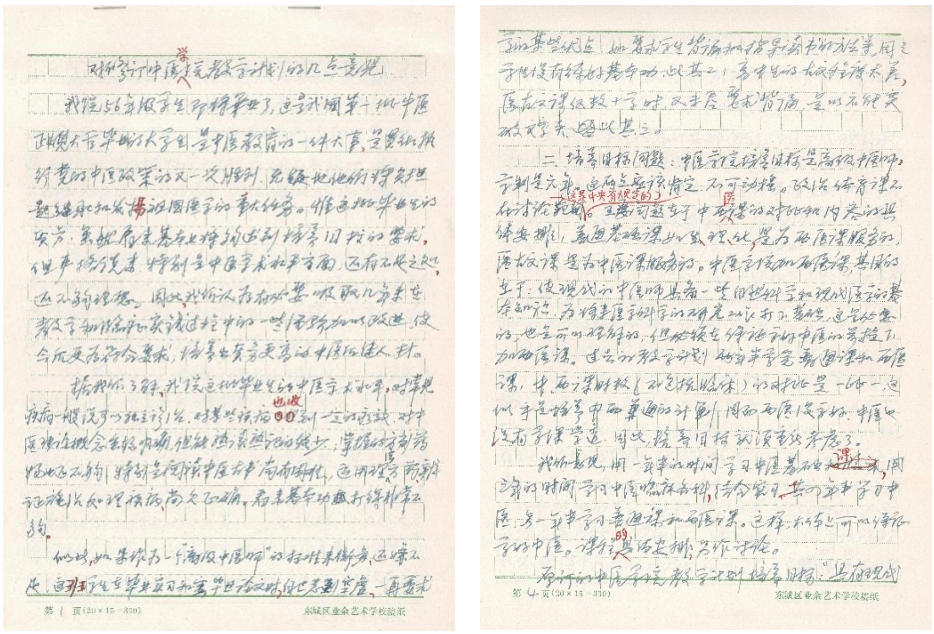


图4　《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任应秋先生录稿

2.4　教材版本界定标准调整

教材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材版本的演变反映了学科发展水平和教育理念的变迁。《校志》对于教材也有专篇记载,并将1979年出版的《生物化学》、1988年出版的《生物化学》(中药专业用)、1987年出版的《医用物理学》、1986年出版的《分析化学》(上、下)、1974年出版的《药用植物学》《有机化学》、1976年出版的《中药化学》、1980年出版的《中草药成分化学》《中药鉴定学》,以及1992年出版的《中医医院管理学》《中医教育管理学》均标记为"第一版教材"[3]174,这也值得商榷。

1956年,国务院批准建立北京、上海、广州、成都4所中医学院,但当时教材未统一规划,各校自编教材内容差异较大,高等中医药院校教育面临教材短缺、内容不一的困境。为解决这一问题,1959年9月21日,卫生部发布《关于编写中医学院中医课程教学大纲和教材的意见》,同年召开全国中医药教材编写会议,决定由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成都5所中医学院共同承担中医教材编写任务[8],并于1960年9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这就是中医药高等院校的第一版统编教材,标志着高等中医药教育教材建设的规范化开端,总计有经典类3部即《内经讲义》《伤寒论讲义》《温病讲义》,基础类5部即《医古文讲义》《中国医学史讲义》《中药学讲义》《方剂学讲义》《中医诊断学讲义》,临床类8部即《中医内科学讲义》《中医外科学讲义》《中医伤科学讲义》《中医妇科学讲义》《中医儿科学讲义》《中医眼科学讲义》《中医喉科学讲义》《各家学说及医案选讲义》[9],针灸类1部即《针灸学讲义》。其中,《内经讲义》《中国医学史讲义》《各家学说及医案选讲义》3部由本校主编,其他则为参编。1962年的《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认为:"尤其是卫生部直接领导的5个中医学院所编的讲义,有系统有条理,简明扼要,文字浅近,对目前一般高中生水平来说,还是适合的。"[7]324但"不过,为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并与教学时数的增加相适应起见,都有重新安排补充教材的必要。"[7]3241962年12月5日,卫生部《关于中医学院教学工作的几个问题和执行1962年修订的六年制中医专业教学计划的通知》中,又增加了《金匮要略讲义》一部教材,并于1964年陆续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即中医药高等院校的第二版统编教材,虽然《金匮要略讲义》首次出现,但是整体应归于二版教材系列,而不是一版教材系列。《校志》在记载教材出版情况时,将1979年《生物化学》、1988年《生物化学》(中药专业用)等均标记为"第一版教材",如从出版版次角度来看,这些教材是本校教师参与编写或主编的该课程首次出版教材,但从高等中医药院校教育中教材出版的角度看,则不应称为第一版统编教材。

所以,应对《校志》中教材相关部分表述进行修订,标明首次出版与所属统编几版,并注明出版社信息,而不是简单归为第一版教材。这样修订不仅是对教材版次的明晰界定,也能将中国中医药高等

教育教材发展沿革及学校教材历史有效展示。

2.5　首届毕业生人数的核实

《校志》记载第一届毕业生为100人[3]215,而又说“同年9月新招生的120名第一批学员入校,因任务紧急遂借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地址,进行教学工作”[3]549。参考1996年由本校印制的《校友通讯录》中可以查到第一届1956级中医专业毕业生为109人,另有已故4人;而在2006年本校印制的《校友通讯录》中,1956级中医专业毕业生为102人,已故10人,以这两份通讯录对比,2006年的校友通讯录中缺少一位张守和校友,在1996年的通讯录中记录其在山西省孝义市中医院任主任医师,但在2006年的校友通讯录中却缺少了此人记载。无论是1996年版还是2006年版,对1956年中医专业毕业生的人数都不是《校志》中所记载的100人或者120名。

《明医之路 道传薪火 第1辑》记载:“1956年进校时,全年级学生123人。6年间因病、因事休、退、转学共23人,毕业时仅有100人。”[10]但是在本书第36页对每一位毕业生进行信息记录时,又记录了105人的具体信息。在本书首页也有一张1956年级毕业学生合影,上面共有137人,其中从上往下数第5排坐着的应为当时的教师,有22人,第4排从中间往右数10位应也是老师,所以图片上的学生人数应为105人,与本书第36页所记载的毕业生具体信息相一致。具体见图5。



图5　本校1956级学生毕业照

所以对于本校第1届1956级中医专业毕业生人数的问题也应结合校友口述复核开展,以利于校友库的建设,争取不遗漏任何一名校友。

3　《校志》补遗研究的意义

《校志》作为本校发展史上重要的文献资料,对于以本校为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院校教育发展史有着重要参考价值,为此结合相关一手史料,以审慎态度围绕《校志》记述不清或者混淆之处进行补遗研究有着长远意义。

3.1　筑牢对大学文化的认同感

《校志》补遗研究不仅是单纯的文字修正工作,其深层意义在于对校史叙事的核实与大学文化认同的筑牢,使校史脉络更加清晰准确,展现了本校办学初期实事求是、勇于调整的务实精神,丰富了校史的精神内涵。《校志》作为校史的重要载体,对于增强师生归属感和认同感也有重要促进,准确、生动、有温度的校史叙事,能更有效地唤起师生校友的情感共鸣。

3.2　整合多元证据开展历史复原

对于本校相关早期历史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文字记载,必须整合档案文献与实物证据以复核,由于相关一手史料散佚很快,故应加强对相关实物证书、原始刊物、报纸新闻、口述调研的收集与整理。应具有一定的批判性思维,认真研判《校志》所存在的记录矛盾之处,在结合多元证据的基础上,运用逻辑推理、历时性比较,去发现问题、追踪变化。

3.3　补遗勘误推动校史研究学术化

补遗勘误是我国古代续修志书的传统[11],也应是现代大学校史研究的常态。随着档案开放、新史

料发现,以及研究视角的更新,《校志》内容必将面临不断的审视与修订。此次只是针对本校建校初期几个关键点进行的一次初步勘补,未来仍有大量工作可做,如系统梳理校志中人物传记、重大事件、学校发展等多方面记载的准确性,进而上升到学术性研究,以更好地展示出学校的深厚底蕴。

4　小结

对《校志》中5处记载前后矛盾或不确切之处的补遗研究,有助于为开展《校志》修订提供具体、可信的勘误补遗依据,进一步提升《校志》的学术质量与历史价值。同时结合相关一手史料例证开展案例剖析,以还原历史真实、构建校史叙事、增强大学文化认同,这为同类校志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借鉴,为校志、校史研究学术化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 李洁鸿,张耀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释义[M]. 北京:中国法治出版社,2025:106.

[2] 李继隆. 志苑躬耕录[M]. 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

[3] 北京中医药大学校志编委会. 北京中医药大学(原北京中医学院)校志(1956年—1992年)[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4] 王文娟,梁贲,史青,等. 北京中医现代教育史上2所进修学校评述[J]. 北京中医,2003(4):53-55.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医司. 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85.

[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93.

[7] 杨殿兴. 中华医药史话:诗情、画意、墨韵[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

[8] 李姝颖,谭鸿铭,马维骐. 关于《中医诊断学》全国统编教材沿革的探讨[J]. 中医教育,2020,39(1):65-67.

[9] 石磊,杨红兵,毛树松. 高等中医院校专业教材建设概览[J]. 湖北中医学院学报,2004(3):53-54.

[10] 晁恩祥. 明医之路 道传薪火 第1辑[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35.

[11] 秦邕江. 补遗勘误与续志质量[J]. 广西地方志,2006(2):60-62,103.

(收稿日期:2026-05-09)

(上接第36页)

[16] Lakoff G,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5.

[17] 谷浩荣,贾春华,付桥桥,等. 隐喻认知及认知科学相关原理在中医理论研究中的应用[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9,21(11):2480-2484.

[18] 贾春华. 认知科学背景下的中医病因病机的概念隐喻研究[J]. 中国医药导刊,2008,10(8):1141-1143.

[19] 贾春华. 中医学: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J]. 亚太传统医药,2009,5(1):11-12.

[20] 张汉宜. 试论"取象比类"是中医理论的精髓[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31(12):4899-4901.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2295.

[22] 苏岚. 隐喻研究的发展、现状及影响[J].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107-109.

[23] 王寅. 认知语言学[M]. 重排校订版.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1:406.

[24] 方宝,吴红瑶. 中医隐喻及其翻译[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24,44(7):874-880.

[25] 郑洪新. 中医基础理论[M]. 4版.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24-25.

[26] 郝梦,黄玉燕,秦培洁,等. 从知识组织与发现视角探析取象比类内涵及应用模式[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38(2):504-508.

[27] 赖月珍. 中医英译的把握[J]. 上海翻译,2008(3):29-31.

[28] 马子密,贾春华. 取象比类:中国式隐喻认知模式[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2,14(5):2082-2086.

[29] 黄雄杰,肖卓然,贾春华,等. 隐喻与中医理论创新[J]. 世界中医药,2022,17(10):1419-1424,1429.

[30] 韩佳桐,杨秋莉,王昊. 中医叙事医学的反思与再现[J]. 医学与哲学,2023,44(12):59-62.

[31] 王一方,方洪鑫. "医者意也"与叙事医学认知哲学的交集[J]. 中医杂志,2020,61(16):1387-1390.

[32] 郭璠,贾春华,赵勇. 基于隐喻结构理论的中医水代谢分析[J]. 世界中医药,2016,11(11):2240-2247.

[33] 刘正光. 隐喻映射的本质特征[J]. 外语学刊,2003(3):8-14.

(收稿日期:2026-03-24)